

# 中国近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的“挂锁”态势分析及启示

黄 强

**【摘 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进一步增加城镇人口,提高城市化率。但是,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有所下降。如何有效地提高各个省份的城镇人口成为各级政府的施政难题,而城市化率的提升又涉及多种复杂因素。文章以省为单位,通过研究中国近10年来城镇人口的增量,结合计算机图形技术,发现城镇人口增长的“挂锁”态势,以及与胡焕庸线的位置关系。文章结合西方移民理论,将城镇人口的增长作为一种移民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城市对移民的拉力和阻力因素,得出影响城市化率的6个可以量化的变量,再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得到提升城市化率的多个路径模型,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拉动城镇人口超过平均增长的首要因素不是收入的增加,而是良好的义务教育环境;其次是低房价。(2)国际移民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运用于中国有户籍制度的城市化情境中,但某些影响因素有所不同。(3)要使本地区人口超平均增长,并不需要具备所有拉力因素,只需结合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强化关键因素。另外,文章预测,到2050年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全国城市人口的30%。

**【关键词】**“挂锁”态势 城镇人口增量 首要因素 胡焕庸线

**【作 者】**黄 强 新加坡南洋学院院长、研究员。

## 一、研究背景

根据联合国数据,2014年,全球人口的平均城市化率为54%,预计2050年达到66%。发达国家和地区2014年平均城市化率为78%,预计2050年达到85%。中国2014年平均城市化率为54%,预计2050年达到76%。这个指标看似简单,但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由于城市化率的提高必须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互相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就有可能陷入瘫痪,所以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城市化率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施政难题,尤其是胡焕庸线以西的省份。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201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总数在波动中增长(见

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全国每年的城镇人口增量呈现波动性,2010 年城镇人口增量达到顶峰。此前呈现波浪式推高,此后呈现波浪式回落,整体趋势线缓慢向下倾斜。中央政府已经觉察到城镇人口增速放缓,并且 2014 年 7 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 1 300 万人以上。到 2020 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 2013 年缩小 2 个百分点以上。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 10 年中,各省城镇人口增量并不是均衡的,全国城市人口平均增量为 36%,而有 19 个省份超过了这个增量,其中天津市甚至高达 57%。这说明一定有某些关键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会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为此,本文将城市化过程视为一种城市移民过程进行研究,以便借鉴相对成熟的西方移民理论(尤其是“推拉”理论),并从中抽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移民影响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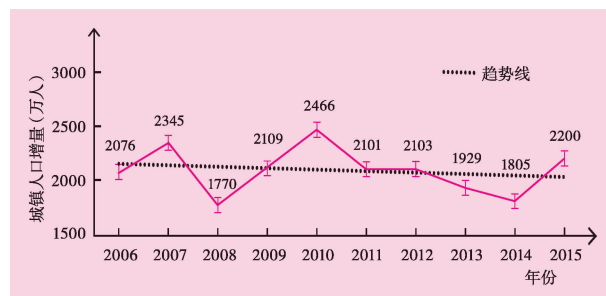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5 年中国 31 个省份  
城镇人口增量变化

## 二、文献综述

随着 19 世纪移民现象的不断涌现,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并进行研究。1885 年美国学者莱文斯坦发表了著名的《移民的规律》一文,这标志着对移民的研究从以往只是简单地记录历史转化为对其一般规律的探讨和研究。莱文斯坦(Ravenstein, 1885)提出迁入地对移民具有“吸引力(拉力)”的概念,形成了“拉力”理论。1938 年,赫伯尔(Herberle, 1938)指出,移民的迁移行为是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他把此前的“拉力”理论扩展为“拉力 + 推力”,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论”。博格(Bogue, 2010)发展了“推—拉理论”,并概括地列出了 12 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 6 个方面的拉力因素。如经济萧条、严重失业、粮食缺乏、生态恶化、外族入侵、内战爆发、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但在当时难以将这些因素进行量化。萨斯塔(Sjaastad, 1962)探讨了移民的成本和回报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后,涌现出多种国际移民理论。如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对迁入国和迁出国的工资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两地间的工资差距是移民的动力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现象日益普遍,移民原因呈多元化、复杂化。学术研究的视角也扩展到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对于人口迁移的机制、动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型,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傅义强,2007)。这些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变量选择的依据。

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城市除了具备以上提及的“拉力”因素外,制度障碍是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当前对中国城市化影响力最大、最直接的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叶裕民,2001)。

三、人口增长的“挂锁”态势

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的存在,中国城市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移民。这表现在非户籍人口即使已经在城市居住多年,但与户籍人口的权利、义务都有本质区别。这就像西方移民,即使已经在迁入国生活,但在没有取得公民资格前,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本质区别。基于这种可比性,本研究将结合西方移民理论,在中国城市化的情境中,找出能促进城市移民、增加城镇人口的若干因素和路径模型,并从中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及路径模型。本研究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一步考察了中国 31 个省份近 10 年的城镇人口增量情况(见表 1)。

表 1 显示,2006~2015 年,31 个省份的城镇人口平均增速是 36%, 但有 19 个省份的增速超过平均增速。根据以上结果,本文利用计算机热度图技术将城镇人口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值的 19 个省份的数据制作成热度图(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在地理上,城镇人口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值的前 19 个省份(图 2 中的深色部分),整体像一把斜放的挂锁,因而称之为“挂锁”态势。这把“挂锁”基本上又是以胡焕庸线为界(胡焕庸,1983),“锁体”重心位于西部,“锁环”位于东部。在这 19 个省份中,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有 9 个,以东的有 10 个。这个“挂锁”态势所反映的信息非常重要,说明在省级层面,虽然对总体人口分布而言,胡焕庸线还没有被动摇,但如果仅

考虑城镇人口增量,对胡焕庸线是一种突破。图 2 显示,胡焕庸线以西的 9 个省份(云南、新疆、西藏、甘肃、宁夏、四川、黑龙江、青海、内蒙古),2006~2015 年的城镇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表 1 2006~2015 年中国城镇人口净增长率

地区	净增比率	地区	净增比率	地区	净增比率	地区	净增比率
天津	0.57	甘肃	0.42	广西	0.38	内蒙古	0.29
云南	0.50	陕西	0.41	青海	0.38	浙江	0.27
西藏	0.50	湖南	0.41	安徽	0.37	广东	0.25
贵州	0.46	江西	0.40	江苏	0.34	上海	0.21
河南	0.46	重庆	0.40	湖北	0.33	辽宁	0.17
新疆	0.43	四川	0.40	福建	0.33	黑龙江	0.10
河北	0.43	北京	0.39	山东	0.31	吉林	0.06
宁夏	0.42	山西	0.39	海南	0.30		

38%,大于全国平均值(36%)。有学者预测,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为145 086万人(袁少良,2014),再根据政府规划2050年中国城市化人口达到76%的目标估算,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1亿。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如果胡焕庸线以西的9个省能保持每十年人口增长38%,那么,以2015年这9个省的城市人口总数1.27亿来推算,到2050年仅西部这9个省的城市人口就会超过3.3亿人,即超过全国城市人口的30%。因此,打破胡焕庸线并非不可能。

这个“挂锁”态势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主导因素是国家的政策扶持。自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来,陆续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2006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2012年),并从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才培养、开发保障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重点推进城市化建设。这充分说明西部地区由于“第一自然”条件恶劣,只有走城市化的道路,改变“第二自然”(王桂新、潘泽瀚,2016),使不适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变得宜居,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落户,从而逐步改变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

此外,以上的“挂锁”态势的启示还包括:2006~2015年大部分省份的城镇人口获得超平均的增长是一个客观事实;为什么大部分省份的城镇人口可以取得超平均的人口增长?形成图2“挂锁”形态区的微观原因是什么?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果能研究清楚,找到关键因素,让各省能够有效地借鉴,那么,中国“十三五”期间旨在提升城市化率的“亿人落户”目标就能确保实现,并且可以事半功倍;西部地区也能得以进一步开发。

## 四、人口增长“挂锁”态势的微观成因分析

### (一) 分析变量的确定

宏观上,国家政策支持是出现“挂锁”态势的主因。但是,政策实施后,具体在微观上改变了哪些变量,从而使大部分省份实现了城镇人口的超平均增长?本研究首先确定影响城镇人口增长的因素。根据国际移民理论,总体上,影响移民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民生、环境4个方面。在中国加速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有学者认为,从治理体系分析,公共资源不足同样挑战着户籍制度改革(叶裕民,2001)。对于发达地区的城市而言,主要并不是财力不足,而是教师、医生、警察等人力资源不足,以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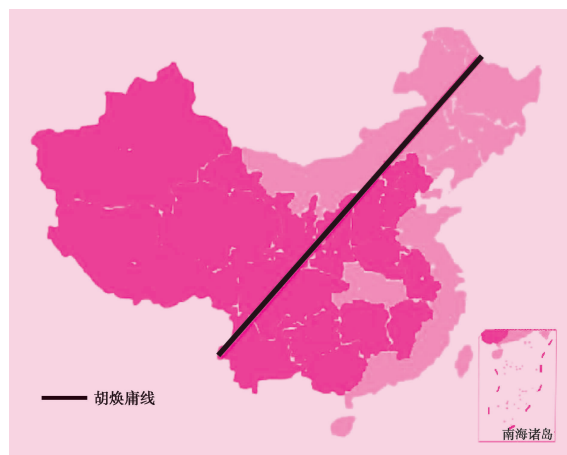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挂锁”态势

注:深颜色的省份城镇人口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值。



间资源缺乏。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重点关注以下变量:(1)增长率,指 2006~2015 年城镇人口净增长率。(2)空气质量,指 2006~2015 年平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吨),用以衡量空气的污染程度,代表对城镇环境的度量。(3)教师数量,指每百万人拥有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量(2011~2013 年平均值),代表对城镇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度量。(4)高校数量,指每百万人拥有 2006~2015 年平均高等教育学校数量,是对城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度量。(5)医师数量,指每百万人拥有执业医师数量(2008~2015 年平均值),是对城镇医疗发展水平的度量。(6)收入,指 2006~2015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是对城镇收入水平的度量。(7)房价指数,指 2006~2015 年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是对城镇房价水平的度量。在真值表中,当对应变量的取值大于全国均值时赋值 1,否则赋值 0。城镇人口净增长率是本研究要关注的结果变量,其他 6 个变量为解释变量。

## (二)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是 2006~2015 年数据,由于数据量不大,如果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建模,可能会使模型存在较大的误差,从而缺乏说服力。因此本研究采用一种适合小样本研究,同时又是被国际认可的方法,即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原理是使用布尔代数的规律和方法来探索宏观社会现象,它可以对多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导致的可能结果进行比较。同时,该方法结合现实中已经出现的结果进行对比定性研究,从中发现关键变量和优化路径,指导未来的行动对策或政策。其本质还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但又区别于纯定性研究方法,因为其处理过程是定量的、可复制的,而且是用计算机软件辅助完成的。通常纯定性导向的研究人员所能获得的案例数较少,而且很多无法定量测量,所以只能对所获得的有限案例进行尽可能多个视角的分析,以期获得尽量多元的信息。同时还要结合案例及历史信息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才能发现一些潜在的规律。定性比较分析的过程使用的是面向变量的定量方法。以布尔代数为基础的逻辑比较方法可以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各种逻辑关系表示为原因和结果条件的组合。这样,这些组合之间就可以进行互相比较、分析,然后通过配对比较过程进行逻辑上的简化。这些简化过程以现有的实际案例组合为依据,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算法找出所有具备一致性和足够覆盖率的组合路径,并对其进行逻辑最小化,其目标是最简明的组合方式表示产生特定结果的不同条件组合(Ragin, 2006)。总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使因变量发生的最典型、最精简、最核心的原因组合路径(毛湛文, 2016)。

本研究使用的软件是模糊质性比较方法(fsQCA)2.0 版(Ragin 等, 2006),它既可以处理模糊集数据,也可以处理清晰集数据。所谓的模糊质性比较方法(fsQCA)是在质性比较分析 QCA 方法的基础上发展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真值表的赋值只能取 1 或 0(所以称为“清晰集”以区别于“模糊集”),而某些变量在 1 和 0 之间赋值会更加精确,因此,研究人员改进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而得到模糊质性比较方法(fsQCA)。本研究

为了使计算机处理过程更清晰地被解释,以 1 或 0 进行赋值,形成清晰集。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中国政府部门(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这样可以确保数据的信度。由于有些数据缺失,只能选用其中能找到的年份的数据(如教师和医师数量),最终得到的数据如表 2 所示。

定性比较方法(QCA)的优势是,在样本数不多(一般在 60 个样本以内)的情况下,只要确定了变量数值和阈值,那么,其整个运算过程是可以重复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定量性和科学性。

之所以冠以“定性比较方法”,是由于在确定变量和阈值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当然,任何研究方法都会有不完美之处,定性比较方法(QCA)自然也不例外。除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外,其不足之处还在于,当自变量过多时(如大于 10 个),研究过程和结果不是很直观。

(三) 分析和解释

按照定性比较法的规则,首先需要构建真值表。基于以上的分析,本研究要找出所有城镇人口超全国平均增长的省份,分析其增长的变量。因此,本研究确定的规则为:对于表 2 中的各个变量,当其数值大于该变量的全国平均值时,赋值为 1,

表 2 中国 31 个省份的变量数据

地区	增长率	空气质量	教师数量	高校数量	医师数量	收入	房价指数
天津	0.57	227890	0.25	5.04	0.27	53416	7675
云南	0.50	583366	0.71	3.64	0.33	32958	3624
西藏	0.50	3358	1.29	8.51	0.50	52927	3403
贵州	0.46	1131094	0.95	3.95	0.33	35568	3351
河南	0.46	1357643	0.75	2.90	0.31	31545	3283
新疆	0.43	691225	0.92	4.05	0.44	36873	3289
河北	0.43	1320602	0.52	3.33	0.33	33120	3853
宁夏	0.42	366716	0.62	4.99	0.38	40261	3347
甘肃	0.42	552798	0.89	4.21	0.36	32963	3168
陕西	0.41	846298	0.65	5.02	0.33	36024	4093
湖南	0.41	748207	0.58	3.92	0.30	33457	3290
江西	0.40	573122	0.61	4.18	0.27	31801	3644
重庆	0.40	665583	0.49	3.40	0.24	38407	4189
四川	0.40	997114	0.61	2.80	0.38	36324	4285
北京	0.39	111336	0.19	5.19	0.41	73118	15772
山西	0.39	1297545	0.68	4.12	0.42	35668	3413
广西	0.38	707208	0.60	3.43	0.31	33083	3676
青海	0.38	145024	0.59	3.92	0.39	40342	3400
安徽	0.37	530565	0.60	4.04	0.26	36487	4109
江苏	0.34	1050394	0.39	3.11	0.28	43752	5704
湖北	0.33	643640	0.50	3.97	0.32	34015	4206
福建	0.33	398763	0.46	3.86	0.26	37067	6822
山东	0.31	1694135	0.54	2.66	0.35	36644	4100
海南	0.30	28643	0.57	3.72	0.28	34058	7255
内蒙古	0.29	1393311	0.46	3.26	0.37	38110	3394
浙江	0.27	676972	0.36	2.91	0.33	44937	8648
广东	0.25	954435	0.40	1.90	0.23	44017	7468
上海	0.21	323199	0.17	3.25	0.26	71373	13388
辽宁	0.17	1087276	0.37	3.82	0.32	36043	4479
黑龙江	0.10	497379	0.46	3.56	0.31	31010	3726
吉林	0.06	383860	0.45	3.68	0.37	32794	3696

反之为0。按照这一规则,根据表2的数据得到真值表(见表3)。将表3引入QCA软件进行运算后,得到以下两类路径。

1. 复杂型路径

复杂型分析总结了各省实现人口超平均发展的5种路径(见表4)。

表3 中国31个省份的变量真值表

地区	空气质量	教师数量	高校数量	医师数量	收入	房价指数	结果
天津	0	0	1	0	1	1	1
云南	0	1	0	0	0	0	1
西藏	0	1	1	1	1	0	1
贵州	1	1	1	0	0	0	1
河南	1	1	0	0	0	0	1
新疆	0	1	1	1	0	0	1
河北	1	0	0	0	0	0	1
宁夏	0	1	1	1	1	0	1
甘肃	0	1	1	1	0	0	1
陕西	1	1	1	1	0	0	1
湖南	1	1	1	0	0	0	1
江西	0	1	1	0	0	0	1
重庆	0	0	0	0	0	0	1
四川	1	1	0	1	0	0	1
北京	0	0	1	1	1	1	1
山西	1	1	1	1	0	0	1
广西	0	1	0	0	0	0	1
青海	0	1	1	1	1	0	1
安徽	0	1	1	0	0	0	1
江苏	1	0	0	0	1	1	0
湖北	0	0	1	0	0	0	0
福建	0	0	1	0	0	1	0
山东	1	0	0	1	0	0	0
海南	0	0	0	0	0	1	0
内蒙古	1	0	0	1	0	0	0
浙江	0	0	0	0	1	1	0
广东	1	0	0	0	1	1	0
上海	0	0	0	0	1	1	0
辽宁	1	0	1	0	0	0	0
黑龙江	0	0	0	0	0	0	0
吉林	0	0	0	1	0	0	0

路径1:教师数量\*~医师数量\*~收入\*~房价指数<sup>①</sup>。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某省城市义务教育的发展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商品房价格低于全国平均价格时,即使收入和医疗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能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36%。这一结论看似出乎意料,因为传统的西方移民理论认为,人们移民的主要目的通常是增加收入,由此推断,收入越高的地区,人口增长应该越快。但事实并非如此,反而是良好的义务教育条件和低房价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云南、贵州、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安徽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

路径2:空气质量\*教师数量\*~收入\*~房价指数。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某省城市义务教育的

① 路径中“\*”表示“逻辑与”,“~”表示“逻辑非”。

发展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商品房价格低于全国平均价格时,即使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空气污染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数,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能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

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31%。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良好的义务教育和低房价是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而收入和空气污染还在其次。河南、贵州、陕西、湖南、四川、山西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

路径3:空气质量\*~高校数量\*~医师数量\*~收入\*~房价指数。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某城市商品房房价低于全国平均价,即使空气质量不好,医疗、高等教育、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能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省份的10%。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安居才能乐业仍然是一条客观规律。所以,维持商品房房价的稳定性,进一步实现家家拥有自己的房屋,必然是各个城市吸引人口的良策。河南、河北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由于这种路径只有两个实例,其参考价值会低一些。

路径4:~空气质量\*教师数量\*高校数量\*医师数量\*~房价指数。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该省的城市商品房房价低于全国平均价,空气质量良好(平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义务教育、医疗、高等教育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能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26%。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在一个城市安居之后,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教育、环境和医疗。所以,管理城市的政府任何时候都要关注民生,这个城市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新疆、西藏、宁夏、甘肃、青海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

路径5:~空气质量\*~教师数量\*高校数量\*收入\*房价指数。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该省的城市商品房房价高于全国平均价,空气质量良好,义务教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等教育和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能超过全国

表 4 定性比较法的复杂型路径 %

序号	路 径	路径覆盖率	一致性
1	教师数量 *~医师数量 *~收入 *~房价指数	37	100
2	空气质量 * 教师数量 *~收入 *~房价指数	32	100
3	空气质量 *~高校数量 *~医师数量 *~收入 *~房价指数	11	100
4	~空气质量 * 教师数量 * 高校数量 * 医师数量 *~房价指数	26	100
5	~空气质量 *~教师数量 * 高校数量 * 收入 * 房价指数	11	100

注:结果总体覆盖率为 94%,结果总体一致性为 100%。

表 5 定性比较法的简约型路径 %

序号	路 径	路径覆盖率	一致性
1	教师数量	79	100
2	高校数量 * 收入	26	100
3	空气质量 *~高校数量 *~医师数量 *~房价指数	11	100

注:同表 4。



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10%。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高收入阶层不怕高房价,他们追求高等教育和良好的空气质量。天津、北京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不过,最近这两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使其吸引力有所减弱。

## 2. 简约型路径

定性比较法的一大优势是可以把复杂路径进行科学的逻辑运算后得到最简路径,从而找出最关键的路径和影响因素。表5给出的是3种最简路径。

路径1:教师数量。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只要当某省的义务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的概率达79%。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良好的义务教育是促使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云南、西藏、贵州、河南、新疆、宁夏、甘肃、陕西、湖南、江西、四川、山西、广西、青海、安徽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

路径2:高校数量\*收入。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某省的高等教育和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可以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26%。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大学多,收入高的城市有更大的吸引力或拉力。天津、西藏、宁夏、北京、青海的城镇人口增长属于这种路径。

路径3:空气质量\*~高校数量\*~医师数量\*~房价指数。这一路径反映的信息是,当某省的商品房价格低于全国平均价格,即使医师、高校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空气污染高于全国均值时,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可以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这种情形占有所有城市人口超平均增长的省份的10%。这一结论反映的事实是,低房价对人们的吸引力甚至高于良好的医疗条件,高等教育条件和环境,特别是对于健康没有问题的年轻人。河南、河北的城镇人口增长是这种路径的典型。由于这种路径只有两个实例,其参考价值会低一些。

总之,良好的义务教育水平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因素。事实上,近年来,由于高等学校的扩招,高考录取率已大幅度提高,初中考高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此,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家长的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未来高端人才的培养,也关系到未来占多数的城镇普通就业人口的基本素质。

##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2006~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人口增量“挂锁”态势的研究发现:(1)促使本地区人口超平均增长的客观原因中首要因素是良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环境;其次是低房价。这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的人们移民动因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不同,说

明在中国基本实现小康的背景下,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子女教育和生活的舒适程度。(2)国际移民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运用于中国有户籍制度的城市化情境中,但某些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如政治因素。由于中国各省之间没有政体的区别,所以考察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原则上不必考虑政体因素。但是,制度因素必须考虑。如户籍制度对于不同级别的城市,入籍的要求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城市化的阻力,另一方面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管理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3)要使本地区人口超平均增长,并不需要具备所有拉力因素,只需结合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重点是关注民生,把公共服务做好,强化关键因素。如提高义务教育水平,降低房价,改善空气质量,提高收入水平,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强化医疗服务等,都能够吸引非户籍人员落户,使本地区人口超平均增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建议,政府进一步强化鼓励合格的初中教师支援西部城镇的政策。如提高待遇,定期交换等,其目的是普遍提高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水平。同时,利用政策有效控制西部城镇的房价水平,使其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明显优势。这样,对于提高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 参考文献:

1. 傅义强(2007):《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第3期。
2. 胡焕庸(1983):《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毛湛文(2016):《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第4期。
4. 王桂新、潘泽瀚(2016):《中国人口迁移分布的顽健性与胡焕庸线》,《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5. 叶裕民(2001):《中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6. 袁少良(2014):《基于BP神经网络的中国人口预测》,《科技广场》,第10期。
7. Bogue D.J.(201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hat is Driving it? What is its Future? <http://popcenter.uchicago.edu/archived/2010.10.28%20Bogue%20Migration%20Paper%20DRAFT.pdf>.
8. Herberle R.(1938), The Cause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3(6):932-950.
9. Ravenstein E.G.(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48(2):167-235.
10. Ragin C.C., Drass K.A. and Davey S.(2006), Fuzzy-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2.0. Tucson, Arizo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Arizona.
11. Ragin C.C.(2006), User's Guide to Fuzzy-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2.0. Tucson, Arizo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Arizona.
12. Sjaastad L.A.(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80-93.
13. Todaro M.P.(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138-148.

(责任编辑:朱 犁)